



本文二维码
单篇扫描下载

经营家庭：现代化进程 与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能动路径

班 涛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合肥 230601)

摘 要 面对现代化进程,一般农户通过经营家庭予以积极应对,包括对家庭目标的调整、家庭资源的优化运作、家庭伦理与结构的调适。以代际合力为核心的经营家庭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推动了农村家庭从传统向现代的能动转型。农村家庭依靠内部团结合作达成有序发展,使得其转型展示出韧性与活力。然而,农村家庭的顺利转型离不开村社集体与国家的制度支撑,这些制度是中国农村家庭完成转型与发展的优势所在。

关键词 现代化进程 农村家庭转型 城市化 经营家庭 制度优势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20) 04-0117-1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411

一、农村家庭现代化转型的 研究回顾与拓展

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城镇化层面考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9年的60.6%,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1.72亿提高到2019年的8.48亿。城市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地域转移与职业转移,其核心为“人

的城市化”,即进城农民要能在城市生存居住、稳定就业以及完成家庭再生产,这样才属于高质量城市化。^[1]从宏观层面来看,高质量城市化离不开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前列,研究者将此主要归结为土地制度、地方政府角色、晋升锦标赛体制、政党制度以及儒家伦理等。^[2-4]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丰富且低廉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他们以较低的工资待遇与社会保障水平参与到工业生产中,这些低廉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家庭场域中完成,

收稿日期 2019-12-09

作者简介 班涛 (1988-),男,安徽淮南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 (S020118002/091)

这一目标的达成得益于包括父代在内的联合家庭。

对于现代化进程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有争论。以古德等为代表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主张现代家庭趋向于核心化、平权化与私密化。^{[7] (P8-12)} 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呈收缩态势,家庭结构愈益小型化,家庭不断从公共领域后撤,其与社区及亲属的关系在弱化而主要发挥抚育与情感交流的功能。由于秉持线性进化观念,这一理论主张西方社会家庭的现代转型具有普世性。家庭现代化理论对理解转型中国的很多现象有帮助,如离婚率上升、生育率降低与妇女地位提高等,然而这一理论仍有一定局限。具体而言,首先家庭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割裂对立,事实上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之间具有无法割舍的延续性,在农村家庭结构上表现为“新三代家庭”,代际间并未走向分离而继续保持团结。同时,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8-9] 其次家庭现代化理论强调了工业化与市场化对家庭的改造的一面,忽略了家庭具有能动的对现代化进程产生作用的一面。最后,家庭现代化理论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家庭转型路径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通过考察农村家庭如何实现城市化目标,可以透视家庭转型的能动过程与内在机理。农村家庭转型的目标在于实现以城市化为核心的家庭发展,这要求大量的家庭资源的投入,如何实现家庭资源的积聚与优化配置非常关键。除资源之外,还需家庭目标、伦理、结构与之相配合,这几个方面构成了经营家庭的基本内涵。不同于发展经济学主要探讨宏观层面的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经营家庭的概念借鉴于发展经济学,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

家庭发展,主要是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一般中国农村家庭何以实现有序发展。经营家庭的过程中家庭目标、伦理与结构会被重构,由此推动了农村家庭的能动韧转型。家庭韧转型的概念借鉴于折晓叶提出的农民通过既柔软又坚实的韧武器达到行动目标。^[10] 农村家庭韧转型指的是农村家庭在实现现代化发展中所具有的韧性,其内涵包括柔韧与坚韧两个方面。家庭韧转型的展开得益于一定的制度支撑,并进而推动了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研究方法属于质性研究,研究结论则是基于多次田野调查的总结提炼。为了便于分析论述,选取了鲁西南 W 村、皖南 X 村与粤西北 S 村作为经验表述对象。^[11]

二、从生存到发展: 现代化进程与农村家庭目标变迁

斯科特对传统东南亚小农的处境做了形象的比喻,“他们长久地处于一种‘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即使是细微波澜也会导致灭顶之灾”,由此“生存安全”构成了小农的第一要务。^{[12] (P13-15)} 费孝通指出在传统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即使通过一定的家庭副业,小农家庭仅能勉强维持基本生存,无法形成家庭节余。^{[13] (P67-71)} 黄宗智将传统土地资源有限下小农通过过密化的劳动力投入获取经济产出的增加以保障生存的家庭生计模式称之为糊口经济。^[14] 在传统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占有不均突出,根据统计资料的分析,新中国土地改革前,占农村总人口不足 7% 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的耕地比例约 52%,相反占农村总人口 52.37% 的贫雇农只占有耕地 14.28%。^{[15] (P47-52)} 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与有限,使得传统小农家庭的目标停留在生存层次,包含个体生存与家庭再生产

两个方面，这里所指涉的传统社会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社会阶段。个体生存指的是满足个体维持生命所需的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这很大程度上通过家庭自给满足。传统小农家庭还要保证基本的家庭再生产，进行婚配是其关键内容。为了顺利完成婚配，男方要给女方添置些新衣物和办酒席，对于这些仪式小农家庭会尽量办得隆重从而获得村落的认可。然而婚姻花费对于勉强维持温饱的农户家庭而言构成不小的压力，不少家庭要为此举债。此外在传统农业社会，“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受到推崇，导致多子家庭较多，这使得家庭大部分资源耗费在为多个儿子完成婚配上，家庭难以实现积累。不仅如此，传统小农家庭的分家制度为“诸子均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被析分，进一步导致小农家庭锁定在低水平的生存境地。^[14]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正式拉开现代化发展的帷幕，40年间取得了让世人震惊的成绩。农村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得到恢复，农民向城市流动受到的束缚日益减少。农民日益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中，现在活跃在全国城市各个领域的农民工数量已接近3亿。务工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比重日益升高，在此过程中农民的生存境遇大为改善。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特别是年轻一代日益受到城市文化消费观念的影响，城市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日趋完善，城市生活对他们产生了内在吸引力。他们在被城市浸染的过程中萌发了“城市梦”，希望能成为城市人，这带来家庭目标向发展型层次转变。进城目标的实现需要达到以下三个条件。首先是在城市购房，即要能住得下来，这就要支付一定的购房成本。其次是还要能在城市相对体面地生活，这建立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在城市生活，除了购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

外，还需支付一定的物业服务费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费，从而家庭货币化开支会增加。最后是还要在城市中完成家庭继替，即抚育下一代。随着农村家庭的生育观念向现代转变，普遍重视抚育质量，在养育中更加强调“育”的过程。此外他们还希望下一代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为此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就会增加。抚育质量的提升与教育投入的增加意味着家庭支出进一步增大。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正在经历的家庭目标从生存向发展的转变，构成了推动其他家庭要素发生变迁的驱动力。更高层次的发展型家庭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资源投入，如何运作家庭资源很关键，同时还离不开家庭伦理与结构的调适，这几个方面形成合力即为经营家庭的过程。经营家庭作为一整体，无法只依靠某些要素就能达成，不同要素在经营家庭中扮演不同角色并由此推动家庭向前发展，家庭目标、资源、伦理与结构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

三、代际合力： 农村家庭的资源运作机制

在分析农村家庭发展的实现过程之前，我们需要对农村家庭的“农户”范畴进行一定的界定。随着农村社会的流动开放，农户之间分化程度在提高，一部分农户通过子女考上大学以及经商做生意等实现了体面进城，他们属于农村中的精英，但这类农户在农村中只占到很小的比例。相较于占比很小的农村精英进城，一般农户的城市化更具有代表性，后者在村庄中属于多数，他们更能反映中国城市化的一般趋势，因此应重点考察属于多数的一般农户家庭。有研究者发现当前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呈非精英化特征，而且一

定比例的非精英农户已经实现了进城。^[17] 一般农户家庭的城市化目标主要服务于年轻子代的发展需求,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单纯依靠子代力量无法完成,他们在社会大生产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使得其无法积聚起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从而需要父代参与进来,通过代际合力与对家庭资源进行优化运作以达成这一目标。因此,从家庭的外延上看,一般农户家庭包含了中老年父母、年轻子代与孙代在内的三代人,其中中老年父母指的是年龄在五六十岁这一批人,年轻子代在年龄上指的是处于二三十岁这一阶段。代际合力的关键是实现对家庭资源的积聚整合,其以优化配置家庭人力资源为基础,再对家庭成员的时间资源进行集约化使用,还要对共同积攒的物质资源充分有效利用,最终达成家庭发展目标——人的城市化。由于一般农户进城为一持续的过程,相应的代际合力形式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依据家庭所处生命周期的具体阶段,可将代际合力形态及家庭资源运作机制析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 进城购房立足城市

进城购房是在城市立足的基础,这往往发生在子代成家之前的阶段。基于子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年轻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共同推涨了进城购房潮,一般农户家庭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启了城市化进程。在城市购房需要支付一定成本,对一般农户家庭而言他们缺乏一次性支付全部房款的能力,多半先支付占房款 30% 左右的首付,剩下的房款通过按揭分期偿还。不同等级城市的住房价格不同,以一般的县城为例,一套 100 平方米的商品房首付价格至少在 10 万元,拿到房后还要支付一定装修费用。为了解决在城市住得下来所需费用问题,代际间就要对家庭劳动力进行充分配置。当前中西部农村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

生计模式,年轻人在城市务工,父代在农村务农,这使得家庭有了两份收入。^[18] 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农忙时间大为缩短,在农闲时间父代会就近打零工,男性多选择做建筑工或给种植大户帮忙,女性则除了给种植大户帮忙外还会接些手工活,他们会积极捕获各种劳动机会以扩大家庭收入。目前东部发达地区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定劳动机会,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鲁西南 W 村就有三四家小型服装厂,这些服装厂的订单来自东部沿海,厂子负责简单加工,工作环境较简陋且工资待遇低,但每一个厂都不缺工人。工人主要来自村子里五六十岁的妇女,每一家工厂都有近 10 个妇女在从事生产。虽然按照计件工资,她们 1 天工作 10 个小时平均仅能收入 30 元-40 元,但这些工作岗位仍受到农村妇女的广泛欢迎。一般农户家庭在这一阶段除了对家庭劳动力充分配置以增加家庭资源之外,还会对所积攒的家庭经济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父代会要求在外务工的子代留下基本生活费用后剩下的交由父母保管,他们会给子代存起来。对于父代的做法,子代多表示理解,因为由父代对家庭资源进行管理,他们比子代更为节俭,从而有助于家庭资源的积聚。在这一阶段,代际通过对家庭人力的充分运用以积攒资源、由父代对家庭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来整合资源,从而顺利完成进城的第一步——在城市购房。

年轻人在结婚前把钱交给父母比留在自己身边还放心,年轻人理财意识比较淡薄,不像父母把钱守得紧,再说将钱交给父母,父母只是保管员,这些钱最终还是要用于我们结婚买房上。(山东菏泽 W 村,蒋某,2019 年 2 月 20 日访)

（二）抚育下一代完成子代家庭再生产

在拥有住房基础上，实现进城还意味着子代有能力在城市开展抚育下一代的家庭再生产。随着子代在城市生活定居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多会生育，从而面临抚育下一代的责任。由于子代一方面在城市收入不高，另一方面他们平时忙于上班，没有时间来照顾小孩。倘若通过市场方式请保姆，不仅花费超出年轻夫妻的承受能力，而且将小孩交给外人照管，他们也不放心，因而在抚育下一代上同样需要代际合作。根据国家卫计委调查显示，2015 年约 1800 万的老年流动人口中，其中因照顾晚辈而进城的比例高达 43%。有学者指出，农村青年城市化过程中，老漂群体发挥着特殊作用，老漂通过照顾晚辈实现对子代的支持，缓解了子代面临的压力。^[19]当前老年人帮忙照顾孙辈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女性进城，男性留在村里，在家种田与打零工；另一种为中老年夫妻共同进城。总体上前一种方式更为普遍，因为在照顾小孩上女性更擅长，同时前一方式体现了对家庭人力与时间的更有效配置。老年人照顾孙辈往往会持续到孙代上初中后不用接送为止，这一时间长达 10 年上下。从内容上看，他们照顾孙辈主要负责孙辈日常生活以及接送。老年人在城市与子代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他们除了照顾孙辈之外，还会给子代做饭洗衣。

皖南 S 村 50 多岁的姚某，其儿子 3 年前结婚，现买房定居在芜湖。婚后一年多儿媳生了一个男孩，姚姓妇女在孙子出生后就到城里照顾，现生活基本上围着孙子转。在谈到其在城市里生活的感受时她说到“我刚来到城市很不适应，这个小区没有我认识的人，邻里相互间也不串门，大家各顾各的，在这里我找不到说话的人。但我还是觉得为了儿子老年人做出

牺牲是值得的，年轻人在城市生活负担重，压力大，做父母的应该为其分忧解难。”姚姓妇女的儿子宋某认为倘若没有父母的帮助，单靠他们小夫妻根本无法应付，父母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资源，他们对父母的支持内心充满感激。（安徽芜湖 S 村，姚某、宋某，2019 年 5 月 3 日访）

（三）老人返乡养老

随着孙辈到一定年龄后，老年人多会选择返乡，他们通过在农村与土地相结合的自养方式来降低子代的养老负担。对生活在城市的子代而言，随着下一代年龄的增长，家庭再生产进入到他们不仅要抚养下一代，还要让下一代在城市接受教育，对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家庭发展的重要内容。子代在自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向市场购买方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投入，如送孩子上补习班、兴趣班等，家庭教育支出在这一阶段会增加不少。进入到家庭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子代除了要在培养下一代上多投入之外，他们的父母年龄在进一步增长，逐渐面临赡养父母的任务，因此他们应向父代反馈一定的资源以保障父母生活。实践中老年人在这一阶段多不会选择继续与子代在城里居住，他们更愿意返乡。回到熟悉的村庄不仅生活更自在，而且老年人在尚有劳动能力时会一直务农。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普及，他们的劳动时间得到延长，同时在劳动过程中还能收获满足感。老年人很少主动向子代要钱，他们在农村生活主要靠自己种田和在房前屋后种些蔬菜、养些家禽，而且竭力降低向市场购买物品的比重与频率，从而缩减生活费用支出。随着老年人通过电视和网络接触各种养生信息的便利，他们的身体保护意识增强，除了在饮食结构上调整外，从之前重油多盐转向少油少盐，还会在

早晚吃完饭后散散步或跳跳舞。在这一阶段,老年人认为自己虽不能再给子代提供直接经济支持,但起码要做到不给子女添麻烦,不拖他们后腿,这才叫会做老人。因此在这一阶段,在实现家庭发展上代际仍继续形成合力,老年人以自养的方式为子代集中家庭资源向下输送提供了间接支持。

鲁西南 W 村 60 多岁的王某夫妇,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县城定居,子女都是普通的打工者。王某夫妇现生活主要靠种两亩地以及在院子里种的蔬菜,他们很少买肉,鸡蛋也是趁市场价格低时多储存一些。老两口都有些高血压,除了吃降压药之外,他们饮食逐渐变得清淡,饭后还会锻炼一会儿。老两口平时身体出点小问题都是到村卫生室拿点药对付下,有时就直接忍下。子女打电话询问他们身体状况时,他们不想让子女担心多是报喜不报忧。(山东菏泽 W 村,王某夫妇,2019 年 4 月 12 日访)

经营家庭的核心即是对家庭资源的运作,这就要求代际间合力对家庭人力与时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家庭经济资源的积聚,再通过有效的统筹管理对这些资源集约利用。在普通农户家庭实现城市化的三个阶段都体现了家庭作为一集体理性单位对其成员的整合调动,家庭各成员的能动性都得到发挥,其中纵向的代际合力构成了关键环节。由于子代在进城后每一阶段家庭再生产面临的任務不同,这些任务的完成离不开家庭各种资源的密集投入,因而代际合力持续时间长。从资源流向上看,代际合力更多是中老年父代对年轻子代的支持,家庭资源向下流入从而向子代集中,父代通过不断地付出,为子代实现在城市相对体面的生活且进一步向上

流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农村家庭伦理与结构的能动调适

一般农村家庭实现以子代城市化为核心的家庭发展建立在对家庭各要素经营的基础上,其中树立发展型家庭目标是前提,积极运作家庭资源是核心,此外还离不开家庭伦理与结构的配合。上文对家庭资源运作的分析指出在代际合力中,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多于子代对父代的反馈,这一不平衡的家庭资源分配为何能让父代接受并认同就涉及家庭伦理层面。在长时段的代际合力中特别是在父代进城帮忙照顾孙辈与子代共同生活这一阶段,代际间为了保证密切互动的进行,他们需要对家庭结构予以塑造。家庭伦理与结构在配合家庭资源的合力运作以实现家庭发展目标过程中得到重构,这几个要素的变迁推动了农村家庭的能动转型。在讨论完家庭目标的转变与家庭资源的运作机制后,下面就要转到对家庭伦理与结构的分析上。

(一) 家庭伦理

这里所说家庭伦理,主要指纵向的代际伦理。梁漱溟指出传统乡土社会具有伦理本位的特征,即互以对方为重,体现在父代对子代的“操心”与子代对父代的孝顺上。^{[20] (P35-42)}父代对子代的“操心”包括为子女的婚事操持以及尽力为子代传递更多的家产。子代对父代的孝顺则不仅包括赡养,还包括尊亲,这是子女基本的伦理义务。与传统家庭伦理相比较,有研究者认为当前家庭伦理发生了很大变迁,相当一部分年轻子代对父代进行“代际剥削”,却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21]有学者将子代对父代反馈的养老资源不足归结为孝道的衰落,

并将这一现象称为“无公德的个人”的兴起。^{[22] (P145-151)}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境遇出现危机在于在家庭现代转型过程中父代担负着几乎没有止境的伦理责任,子代对父代构成持续的剥削,这一代际资源交换的失衡是父代主动与自觉为之的,因而其称之为“伦理陷阱”。^[23] 与上述观点不同,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当前之所以出现子代向上反馈资源有限的问题,在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出现了“伦理转向”,即个体在进行家庭资源分配时,优先将资源提供给自己的子女而不是父母,“恩往下流”具有普遍性。^[24] 通过观察转型期农村家庭的代际互动过程及分析他们的心理感受,农村家庭伦理发生转向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家庭伦理可称之为“新家庭伦理”,其与传统家庭伦理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传统家庭伦理属于生存本位,生存需求为家庭第一要务,代际间厚重的责任义务与传宗接代都服务于维持家庭生存需要。“新家庭伦理”则秉持发展本位,相较于生存层次,发展是高层次的且没有止境,家庭发展表现在通过实现子代城市化进而嵌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在家庭资源硬约束情况下,父代做出了一定牺牲。然而父代并不是被动地被子代剥削,而是能动地参与到代际合作中,这缘于父代对发展型家庭目标的认同,他们逐渐调整了对子代反馈资源的期待。父代对子代向上反馈资源较少表示理解,他们了解子代在城市的不容易,认为应向子代多提供支持,即使不能提供直接支持也应尽量不给子代添麻烦,这是做老人的责任所在。在新的责任伦理指导下,父代会劳动到丧失劳动能力为止,他们积极抓住各种机会让其劳动产生价值。

第二,虽然现阶段子代向父代反馈弱化,

但并不意味着子代对父代不需要尽任何义务,子代需为维持父代的基本生存进行兜底,包括在父代生病时对其进行治疗、在父代丧失劳动能力后提供物质保障、在父代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负责照顾。代际间虽然达不到传统社会的厚重平衡,但至少保持着底线均衡。从子代的实践来看,3个村庄现在很少有子代不管老人,而且不同于传统社会,现在女儿也参与进来。子代除了在物质资源与生活照料上为父代提供底线保障之外,代际间在合力过程中的密切互动为彼此进行情感交流提供机会。虽然代际间居住空间分离,然而子代多距离父代不远,他们会时不时回来看望父母。虽然父代对子代的支持要多于子代的反馈,但父代并不追求对等的交换,他们将其对子女的支持看做投资。父代认为对子代投资越多,意味着他们对子代所做的奉献越大,就越能保障子代向他们有所回馈。在现阶段父代通过持续地向子代付出,进一步强化了子代为父代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意识,因此现在代际关系并没有陷入单向的付出与索取境地,在新家庭伦理下代际间形成了模糊的均衡。

(二) 家庭结构

在家庭结构上,包括家庭形态结构与家庭权力结构两个层面。

1. 家庭形态结构

在家庭形态上,传统乡土社会倾向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结构。言心哲指出,以复合家庭为主与世代同堂为特征的大家庭制度在中国传统乡村尤为普遍。^{[25] (P15-18)} 王跃生考察了冀南地区解放前后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指出复合家庭在土改前占据一定比例,随后逐步萎缩。^[26] 传统时期的农村家庭的分家模式以一次性分家为主,即在所有子代都成家之后再进行家产的分割与养老责任的分配,分家由父代主导。在当前转型阶段,有研究者

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的三代家庭仍在顽强地维持着,这一家庭形态结构被称之为“新三代家庭”“新联合家庭”等。^[27-28]在分家模式上出现了“不分家”与“分而不离”现象,即代际间并未走向疏离反而继续保持着合作。^[29-30]上述研究结论与实证调研的发现比较一致。在家庭目标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为更好地对家庭资源进行运作,农村家庭趋向于以三代家庭为主的直系家庭结构,这一扩大的家庭结构将大家庭作为一整体有助于形成合力。然而转型阶段的大家庭结构与传统时期的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结构有很大不同,随着子代进城,代际间在居住空间上处于长时段的分离。在子代成家后,父代与子代各自作为相对独立的财产核算单位,因此代际间属于“分中有合”,这一关系模式对发挥各成员的主动性有帮助。

2. 家庭权力结构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除了在家家庭形态结构上发生变迁,还在家庭权力结构上有所变化。传统农村家庭形成了父系权威,父代作为家长享有当家权。传统时期纵向的父子轴为家庭权力的主轴,横向的夫妻轴处于附属地位。传统时期的家庭权力属于专断权力,即父系家长在行使权力时带有命令色彩,家庭成员分工与资源配置由父系家长主导。此外,在父代主导的家庭权力结构下父代多以威严的形象示人,代际间保持距离,这不利于家庭成员的情感交流。当前转型期由于妇女地位的迅速提高,特别是年轻女性在家庭中话语权的增强,使得纵向父子轴趋于弱化而横向夫妻轴得到强化,推动家庭权力结构向平权化发展。虽然在子代成家前父代享有当家权,但在涉及家庭重大事务时父代会与家庭其他成员进行商议。在子代成家后其小家庭的事务主要由年轻夫妻自主决定,涉及到小家庭的重大事务,子代会征求父代的意见。代际间从父代的支配与子代的

服从走向平等协商,子代与父代作为具有独立性的主体相互给予自主空间。父代不再像传统家长那样过多干涉子代事务,这一平权的家庭权力结构有助于代际间保持长时间的合作,而且还对代际间进行情感交流有帮助。

粤西北S村冯某,现已成家住在市里,其婚后想做点小生意,为此咨询了父母,父母给了些建议。因为冯某现在从事销售职业,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他平时一个月至少回老家两三次,陪父母说说话,聊聊天。冯某认为现在父子各自有一定自由空间但又没有陷入疏离的关系模式,这对父代与子代都有好处。(广东清远S村,冯某,2016年3月17日访)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般农村家庭在实现城市化的目标中撬动了家庭各要素的变迁,他们通过经营家庭推动家庭发展。家庭目标、资源、伦理与结构的全面调适构成了家庭的能动转型过程。这种能动性体现在一般农村家庭在现代化发展中并非被动地接受改造而是主动的谋求发展,在面对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时,他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应对。这不仅实现了家庭秩序稳定与有序发展,而且家庭通过再生产素质高的劳动力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做贡献。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能动地适应现代化任务,这不但没有造成农村家庭的衰落与解体,反而让家庭展示出很强的韧性与活力,因此可将这种家庭转型模式称之为韧转型。农村家庭转型所具有的韧性离不开家庭成员的相互配合,尤其是纵向的代际合作。一般农村家庭在现代化中并未走向与西方社会家庭转型的“趋同化”,而是主动调适进而实现了与现代化之间的“亲和”,其转型方向与路径都具有很强的本土性。

五、农村家庭韧转型的制度支撑

中国农村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以颇具韧性的方式实现家庭发展，虽然家庭内部各要素的有机配合很重要，但家庭的顺利转型离不开一定的外部制度环境。当前普通农户家庭实现发展，建立在村社集体与国家两个层面的制度基础上。

（一）村社集体制度

村社集体制度，包括集体土地承包制、宅基地分配制度与公共生活安排等。村庄以社区成员权身份为原则分配承包地与宅基地，这些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为村民提供了生存保障。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农地制度相较于农业发展，其所发挥的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功能更为重要。^[3] 村民除了拥有承包地，还可以在房前屋后种些菜、养些家禽，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家庭生活很大部分可以自给，日常生活货币化支出减少，生活质量却还不错。村社集体不仅通过正式的分配制度为个体提供保障，而且集体作为村民生产生活的共同体通过非正式制度满足个体的其他层面需求。老年人之所以在照顾孙辈到一定时间后更愿意选择返乡，不仅是长时间与子代共同居住在城市容易引发摩擦，还在于村庄生活对老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村庄共同体属于熟人社会，村民之间高度熟悉并较为亲密，彼此间的人情往来与陌生化的城市社区有很大不同。在村庄生活，老年人不会感到陌生，他们对人和环境熟悉，这里有他们可以进行情感交流的对象，大家相互间可串门、聊天、打牌等，而且村庄还有各种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此外，一些村庄还会组织文化活动，如庙会、唱戏等，粤西北 X 村隔几年在庆祝老祖宗诞辰时就会请外面戏班子来村里唱

戏，每次来看戏的都有好几百人，邻村的也会过来观看。村社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一方面拓展了家庭收入来源，使得家庭拥有务工与务农两份收入，另一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社会保障，从质量上看村庄提供的保障水平属于“低成本、高福利”模式。^[4] 老年人在尚有劳动能力时的自养保证了家庭资源向下输送的集约化使用。倘若缺少了村社集体，一般农户经营家庭发展就无法顺利进行，由此体现出村社集体对农村家庭发展的托举。

（二）国家制度

国家正式制度，包括农业补贴、新农合、新农保等，这些国家为村民提供的普惠式保障，对一般农民家庭而言至关重要。从 2006 年全国正式取消农业税起，农民种田不仅无须交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而且国家还对种田农户有各种补贴，这有助于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收入。同时国家通过各种农业项目保障农田生产顺利开展所需的基础设施，政府对农业生产公共品的供给为农民提供了便利。此外，国家还积极稳定粮食收购价格，从而保证农民种田积极性。国家不但通过农业补贴为农民提供了生活保障，还通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政策，为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发放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的养老补贴。这笔钱虽不多，但对老年人生活构成了很好的补充。有了这笔零用钱，老年人就可用于改善生活，如打打牌或买点好吃的，他们生活就能过得滋润些。国家通过农业补贴与新农保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了支撑后，对老年人而言，最担心的就是生病特别是生大病，意味着家庭经济支出大大增加，子代还要抽出时间照料，会让老年人感觉自己拖累子代，导致一定心理压力。新农合能根据病种将农户看病花费报销一定比例，这切实减轻了农村家庭负担。因此对国家的新农合政策，老年人很欢迎，他们对缴纳合作医疗费用普遍积极。村社集体与国家

的各种制度为农村家庭在现代化发展中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尤其是为在村庄生活的老年人提供了社会保障。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以牺牲某些群体为代价,相反呈现出包容与有序的发展特征,在发展中社会秩序保持了整体稳定。

进一步而言,现阶段在农村家庭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的存续很重要,乡村除了能为个体提供基本生存资料,而且其作为生活共同体使得个体生活得以铺展开来,乡村构成了农民重要的退路。从实现农村家庭的有序发展来看,需要警惕激进的城镇化道路。村社集体的存在降低了农民城市化进城成本与风险,使得农村家庭发展呈现出弹性与韧性。农民即使进城失败还可以返回村庄获得基本保障,待到有机会时再重新启动城市化目标。中国农村之所以能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是以农村家庭秩序稳定为基础的。没有农村家庭的稳定就没有整体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对既有制度的变革需要站在一般农村家庭需求的主位角度进行思考。对当前的承包地与宅基地等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培育需要警惕,维持既有土地制度的设计从而让其继续为农村家庭发展与社会稳定提供支持具有合理性。^[33] 由于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中通过限制城里人获得农村人的承包地与宅基地以及赋予农民自由的返乡权,这使得城乡关系从之前的剥削型向保护型转变。^[34] 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代际合力实现家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农村家庭在城乡之间的团结合作反过来有助于城乡形成融合互惠的新型关系,从而推动中国走上一条温和有序的城市化发展路径。

六、结论与讨论

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实现快速有序发展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习惯于从个体与宏

观制度层面进行阐释,对家庭所起的作用还不够重视。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在讨论农村家庭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现代化发展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应关注农村家庭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通过考察农村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态度与行为,提出了经营家庭的概念以阐释农村家庭能动地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机制,从而深入理解中国农村家庭的现代转型问题。所谓经营家庭,即一般农村家庭通过调适家庭目标将家庭嵌入于现代化进程中,再对家庭资源进行积聚整合与优化利用最终实现家庭发展——人的城市化,在实现家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家庭伦理与结构得到重构。家庭目标、资源、伦理与结构的系统变迁推动了农村家庭的能动转型,农村家庭的顺利转型反过来又促进现代化建设。普通农户通过以代际合力为核心的经营家庭实现家庭发展过程展示出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韧性与活力,使得中国农村家庭转型路径不是与西方家庭现代化转型趋同,相反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家庭转型与西方之间没有共同点,也不意味着向传统农村大家庭模式复归。中国农村家庭转型呈现出代际合作与个体权利共同发展的特征,即代际合作并不意味着对情感交流与个体自由的排斥,二者能够实现共存。这之所以能实现在于代际居住场域的分离以及相对独立的财产核算,代际间分中有合的关系模式下彼此干预不多,从而为个体自由提供了保障。

农村家庭代际间以能动与自主的方式实现家庭发展,中老年父代并非被动地被裹挟进来,他们自觉与主动地对子代在城市中进行家庭再生产提供支持,对子代将资源集中并向下输送而向上反馈较少的做法能够理解。虽然总体上代际间形成了模糊的平衡。但不可否认有陷入失衡的个例现象。代际合力应该是家庭各成员充分发挥主动性,家庭发展由各成员合作

达成，然而实践中少数子代将责任完全转移给父代，他们对父代索取过多造成了对父代生活的挤压，因此需关注农村老年人在转型期的生存境遇。在实现家庭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发展的前提是要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保护，为此一方面在全社会与村落社区中进行孝道的宣传，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对拒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的应使用

法律手段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要进一步丰富，湖北等地老年人通过组织成立老年人协会，不仅保护了老年人的权益，而且通过开展活动充实了老年人的精神世界。^[5] 在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在实现农村家庭发展中，推动代际关系达到更高层次的均衡和谐，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保障，这成为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的方向。

注释：

- [1] 王海娟. 人的城市化：内涵界定、路径选择与制度基础——基于农民城市化过程的分析框架 [J]. 人口与经济, 2015 (4).
- [2] 贺雪峰, 魏继华. 地利共享是中国土地制度的核心 [J]. 学习与实践, 2012 (6).
- [3] 陈科霖, 王频. 地方增长经营型政府的制度逻辑——以“苏南模式”的变迁为例 [J].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2018 (1).
- [4] 周飞舟. 锦标赛体制 [J]. 社会学研究, 2009 (3).
- [5] 杨华. 县域治理中的党政体制：结构与功能 [J]. 政治学研究, 2018 (5).
- [6] 张建雷. 家庭伦理、家庭分工与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进程 [J]. 伦理学研究, 2017 (6).
- [7] [美] 威廉·J·古德 (William J. Goode) 著, 魏章玲译. 家庭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 [8] 张雪霖. 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5).
- [9] 杨菊华, 李路路.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9 (3).
- [10] 折晓叶.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 [J]. 社会学研究, 2008 (3).
- [11] 笔者分别于2016年3月在粤西北S村、2019年4月在鲁西南W村、2019年5月在皖南X村各开展25天、20天、25天的驻村调研。上述3个村庄从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属于一般农业型村庄。
- [12] [美] 詹姆斯·C·斯科特 (James C. Scott) 著, 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 弱者的武器 [M].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1.
- [13] 费孝通. 江村经济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 [14] 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J]. 中国乡村研究, 2010 (2).
- [15] 赵阳. 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16] 王天夫, 王飞, 唐有财, 王阳阳, 裴晓梅. 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2).
- [17] 陈文琼, 刘建平. 家庭发展秩序：非精英农民城市化的核心机制——家庭视角下江汉平原的农民城市化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 (2).
- [18] 夏柱智, 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12).
- [19] 陈辉. 老漂：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代际支持的新方式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2).
- [20]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21] 杨华, 欧阳静. 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 [J]. 管理世界, 2013 (5).
- [22] [美] 阎云翔著, 龚小夏译.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 [23] 李永萍. 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当前农村

- 老年人危机的一种阐释路径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 (2).
- [24] 狄金华, 郑丹丹. 伦理论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J]. 社会, 2016 (1).
- [25] 言心哲. 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分析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8.
- [26] 王跃生. 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4).
- [27] 杜鹃, 李永萍. 新三代家庭: 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 [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8 (1).
- [28] 齐燕. 新联合家庭: 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 [29] 姚俊. “不分家现象”: 农村流动家庭的分家实践与结构再生产——基于结构二重性的分析视角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 (5).
- [30] 龚继红, 范成杰, 巫锡文. “分而不离”: 分家与代际关系的形成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5).
- [31] 姚洋. 中国农地制度: 一个分析框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2).
- [32] 贺雪峰. 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 [J]. 社会科学, 2015 (6).
- [33] 贺雪峰. 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 (1).
- [34] 林辉煌, 贺雪峰.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6).
- [35] 李永萍. 论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与方向——基于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 (2).

The Dynamic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amilies

BAN Tao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rdinary farmers manage their own family by adjusting family goals, optimizing family resources, and adapting family ethics and structure, which responds positively. Managing family with the core of intergenerational synergy has promoted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amilie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ean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amilies demonstrates resilience and vitality due to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which depends on the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amily. However, 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 of rural families 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village community and state system, which are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rural families in completing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modernization; rural family transformation; urbanization; managing family; system advantage